

# 前言

周敏

海外華人社會和華裔身份認同本質上是動態的，受到祖籍國與移居國僑居或定居歷史、不同時期的移民浪潮和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例如，從前的「華人移民」與當今的「華人移民」在概念的外延上有所不同。從前的華人移民大多源自中國大陸，現今的華人移民則不僅包括源自中國大陸，還包括從香港、澳門、台灣以及全球各地而移居至他國的華裔人口。在海外華僑華人研究中，我們通常用「華人」這個族裔身份的概念來涵蓋華裔人口，包括第一代移民及其在移居國本土、或在祖籍地之外出生的後裔。

海外華人社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且地域分佈最廣的移民離散社會之一。自明清以來，大量的華人從中國大陸移居到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東南亞地區彙聚了眾多的華人，佔全球海外華人四分之三左右，成為海外華人社會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至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源自中國大陸的國際移民陷入低潮，基本處於休眠狀態。與此同時，海外華人社會則出現了向其他國家再次移民的現象。經歷了近三十多年的國際移民休眠期後，源自中國大陸的國際移民潮開始日益高漲。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以及相應的國際移民政策的修改放寬，海外華人社會跨國社會網絡的重新開啟，移居國移民政策的改革，以及全球化帶來的地緣政治變化和經濟體系重組，加速了中國大陸的國際人口流動，移民浪潮連天湧動，經久不衰，歷經四十載，至今仍看不到退潮的跡象。

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有八百多萬國民移居海外，這個龐大的移民群體被稱之為「中國新移民」。中國新移民如今已經遍佈全球的每一個角落，在大大小小的移居國裡建立了新的華人社區，與傳統的華人社區在人口構成、社會經濟形態、族裔經濟運作方式、內部組織結構、社會融入模式以及在移居國的社會地位和歸屬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區別。中國新移民群體也因移民個體的社會經濟背景、移民目的以及居住時間長短的不同而各異。同時，中國新移民對移居國和中國的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書旨在探究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當代華人社區，對其特點、形成動因、結果與發展趨勢進行描述與分析。

## 研究背景

從1949年至1978年底的整整三十年間，因為冷戰和其它種種原因，中國基本與西方發達國家隔絕。移居海外被禁止，未經中國政府批准而跨越國境被視為非法越境或偷渡。有海外關係者被視為有間諜或叛國之嫌，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被送去勞改或坐牢。由於30多年人口跨境流動的停頓，加上自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的建立，改變了海外的華人移民社群，從依賴於母國的僑民而轉變為融入所在國的少數族裔社群。華人移民紛紛加入居住國的國籍，成為所在國公民。

自從1978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打開國門以後，大量移民如潮水般地湧出中國，衝擊著世界各國的海岸，在傳統的和新的國際移民接收國形成了新移民社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儘管並非其本意，當代經久不息的中國新移民潮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直接後果之一。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股移民潮由幾個宏觀結構因素所促成。第一，改革開放使大量外資湧入中國。在1980年代，超過四分之三的外資來自於海外華人社會。華裔資本的注入，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啟動了休眠多年的海外親屬聯繫和跨國移民社會網絡。第二，中國

政府清除了國際移民的制度障礙，放寬取得護照的條件，簡化出國手續，允許有海外親屬關係的中國公民合法移民海外。第三，中國放寬了海外留學和研修政策，資助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海外學習和學術交流，同時也允許國人自費到海外留學。最初資助海外自費留學的資金基本上來自海外的親戚。1990年以後，不少經濟能力較強的家庭也有能力資助子女出國留學。第四，由於中國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的海外投資越來越多。這些宏觀結構的因素，加上不少接收國放寬移民政策和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新移民潮推波助瀾，經久不息，方興未艾。

這股新移民潮從本質到形態多姿多彩。中國新移民在不同移居地的人口構成、社區組織和融入模式呈高度多元化。他們有的是親屬移民，有的是低技能勞工移民或高技能技術移民，也有的是投資移民，還有的是學生移民，甚至有的是無證和非法移民。中國新移民不但來自不同的省份，移居到不同的國家，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迥異，移居方式、就業和創業模式也不盡相同，各國和各地區的移民社群形成、社區組織發展、經濟活動和社會融入等方面也截然不同。新移民的這些內在和外在的多元化特徵，打破了原有的有關海外華僑華人的刻板印象，引起了學術界對這個群體的關注和重新審視。

本書源自於2015年12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舉行的關於中國新移民社群形成與發展的國際研討會。該研討會旨在透過剖析中國新移民這一現象，探索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提出創新的研究方法，促進跨學科、跨國和跨地區在海外華僑華人研究。研討會有兩個具體目標：一是批判性的質疑和挑戰基於北營（西方發達國家 Global North）的移民經驗和視角所建立的經典理論，這些經典理論對於解釋當代國際移民的進程、因果、以及社會融入等重大問題已經捉襟見肘，力有不逮，因而有必要對此深入探討，進行新一輪的思想碰撞。二是推進基於南營（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 Global South）的

移民和視角的新理論建構。在這次研討會中，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新加坡、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捷克、德國、英國、加拿大和美國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分享和交流了有關中國新移民的開創性的研究成果。一年以後，研討會的18篇論文經過修改充實，編輯成題為Contemporary Chinese Diasporas《當代華人離散社會》的英文專著，於2017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不僅僅是英文版的直接翻譯本，而是經由各章作者、編者和審譯重新修改和潤色而成，見解獨到，資料翔實，文字順暢。

### 理論與現實意義

國際移民研究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移民動因，二是移民結果。對於移民動因的研究，我們熟知的經典理論模型和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一個貧窮落後的祖籍國背景下的，但對於一個經濟強盛和高度全球化的祖籍國以及頻繁跨國流動背景下的新移民現象而言，現有的理論則缺乏足夠的解釋力。對於移民結果的研究，經典理論基於移民落地生根最終融入移居國主流社會的基本假設，但對當代國際移民中常見的暫居、回流和跨國流動、或者以移民為手段而非目的等現象的研究，經典理論則亟待繼續充實和發展。此外，經典文獻通常強調國際移民如何在逆境中飽受苦難，掙扎求生以及最終被邊緣化，但對於他們在移居國的成功和貢獻較少提及。現存的經典理論大多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幾十年或二戰結束後的二、三十年，大多基於美國、歐洲或北營發達國家的移民經驗、尤其是以美國經驗為中心。在當今全球化迅猛發展的互聯網和移動通訊時代，經典理論及其框架和模型，折射出過時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以及昨天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水準，與現實的差距越來越大。

如今，許多國際移民不再是為了逃離貧窮困境而被迫背井離鄉，更多的是錦上添花，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機會。此外，不僅移民輸出國的政治經濟環境正在不斷的改善，很多南營的發展中國家也

已經成為新的國際移民接收國。對中國新移民進行深入的研究，其理論意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其一，許多南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正在迅猛發展，這些國家有很大的發展和投資空間，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國投資。這些新興經濟體吸引了許多不同形式和具有選擇性的跨國人口流動，其中包括來自城市和發達地區資源豐富的移民，如生意人、投資者、資本家和專業人士等等。此外，新的通訊和運輸方式不但有助於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也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跨國虛擬聯繫和互動。人們憑藉著手中的移動通訊工具，可以身在某國某地輕而易舉地與全球各地的親友和其他人群保持聯繫，維繫和擴大社會網絡。迅速發展的跨國移民社會網絡，不但促進了人口的跨國流動，也刺激了祖籍國國民的移民意願。日益增加的移民需求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生意機會，繼而派生出一個新的移民行業（migration industry），其中包括合法的移民中介服務機構和非法的人口販賣和偷運組織和犯罪網絡等等。這些動因都是經典理論難以充分詮釋的。

其二，經典理論對於當代南營移民接收國的一些獨特的現實，缺乏解釋力。其中一個現實是移民的同化或社會融入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原來是移民輸出國，當今已經成為移民接收國。這些位於南營發展中國家的移民接收國與傳統的北營發達國家的移民接收國不同，不期望也不鼓勵外來移民向本土群體同化或融入本地的主流社會。很多新移民接收國的政府採取的是限制性移民政策，即有限度的允許永久定居和限制加入國籍。他們對新移民日益變動的人口構成和族群關係的複雜性缺乏瞭解，因而往往難以出台較為完善的社會政策，幫助移民適應和融入當地社會。另一個現實是接收國主流社會的多元化。傳統意義上的全球北營的西方發達國家，接收國主流社會大多以基督教新教為主導的白人中產階級群體及其文化為核心，其種族等級制度顯而易見。白人基督教新教族群至上，其他的族裔或宗教群體則處於邊緣化的社會地位。而在南營發展中國家的移民接收國裡，其主流社會沒有以一個白人為主的核心理文化群體，也沒有清晰的種族等級制度，

因而不存在向哪個群體同化的問題，甚至對新移民在本地定居或安家等問題都極少考慮。第三個獨特的現實是階級的異質性。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也隨之帶來了全球性勞動力市場的高度階級分化，一部分移民（尤其是高教育、高技能、懂本地語言的移民）在當地和跨國勞動力市場中能獲得較大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低教育、低技能、不懂本地語言的移民則易遭受剝削，被社會邊緣化。

其三，中國的崛起對經典移民理論是一個挑戰。新移民並沒有重蹈過去從中國遷移到北營發達國家及其殖民地的歷史軌跡。在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國內人口遷移的同時，也出現了數量相對不多但十分明顯的國際或跨國移民潮。這些新移民的人口構成呈現高度多元化，他們的祖籍國和移居國的環境與情境也與老移民從前所面臨的大為不同。他們在移居國的定居和社會融入模式與老移民有著根本的差別。今昔對比，新興的華人移民社區具有更加豐富的經濟實力。新移民不但具有更強的能力建設自己的新家園，成功地融入移居國社會，他們還有強大的祖籍國做後盾，可以自如地穿梭於兩國之間，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生活環境。這些新的結構因素和個人社會經濟特徵，不僅帶來了新的移民適應和融合模式，也帶來了新的移民社區與移居國社會或與祖籍國社會的互動模式，同時對移居國和祖籍國所制定的相關的移民和社會政策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有的新移民不時返回祖籍國生活，或完全搬回祖籍國定居。總之，當今的中國已經經歷了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新移民的現象比傳統的國際移民更為複雜，現有的經典理論難以透徹的解釋當代國際人口遷移、人口跨境流動和流向以及移民的社會融入等重大問題。

研究中國新移民及其社區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人口流動規模最大和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目前，新移民遍佈世界各個角落，他們大都形成了不同形式和規模的族裔經濟和移民社群。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的力量逐漸弱化，中國人民與

海外的華人社群重新連接起來，中國的移民潮（合法或非法，永久或暫時，國際或跨國）可能會迎來一個新的「華人世紀」。這遠比安東尼·里德在《暫居者和定居者》一書中所描述的1740–1840期間的「華人世紀」還要巨大(Reid 1996)。來自中國的潛在的移民潮被喻為「即將來臨的海嘯」(Goldstone 1997)。無論對於中國、亞洲或全世界來說，都是喜憂參半的信號。對於中國和其他移民接收國，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國家的管控力度會因市場化以及海外的移民／族群網絡、組織和社區等因素而受到極大的掣肘。因此，從制定政策的角度，用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視角來充分理解當代移民社群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影響，日趨重要。

## 各章提要

《長為異鄉客？》共收集了18篇論文，按地區分為五大部分—亞洲、非洲、大洋洲、歐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參與此項目的25位學者從跨學科的角度，從個體、地區和國家以及輸出國、接收國和跨國等多層面的互動來分析不同類型的國際移民潮的形成和發展，以及華人新移民的社區建設和社會融入等問題。

第1章「亞洲洲際華人移民的歷史回顧」（周敏、班國瑞）聚焦於亞洲洲際移民。筆者認為，國際移民和移民的社會融入是一個複雜的動態發展過程。從中國大陸湧出來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以及這些移民在接收國定居或暫居後的再次移民，與個人、家庭、祖籍國和移居國的歷史、政策和社會環境，全球範圍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力量（包括殖民化與反殖民化，民族國家的建立，政權的更迭，民族經濟的發展進程等），以及華人移民長期形成的跨地域和跨國的社會網絡等因素的互動相關。

亞洲部分有五篇論文。第2章「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融入問題」（何琳貽、符方瑜）關注中國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的命題。筆者認為，中國新移民被要求融入而形成的壓力與他們所經歷的社會包容或

排斥兩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這些矛盾的產生與表現，受到不同時期的中國向新加坡的移民潮以及國家經濟和移民政策的影響。持續不斷的中國移民潮有利於延續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強化華人的族裔屬性、華族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傳承。然而，華人族群內部的差異性也日漸增大，加深了新加坡華人與新移民之間的裂痕。此外，中國新移民也不是一個單一的群體，他們因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職業類型、祖籍地和移民時間而形成社會分層，這些因素也反過來決定了他們所擁有的簽證類型和成為永久居民或公民的途徑。

第3章「韓國的華人移民群體」（宋滄洙）聚焦於韓國華人社區的演變，探討華人社區的內在差異、在韓國的社會地位和融入模式的差異。在韓國的一百萬多華裔人口中，包括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遷移到朝鮮半島的「老華僑」，以及自1990年代以後抵達韓國的中國漢族新移民和朝鮮族新移民。中國新移民不僅族裔身份不同，社會經濟背景也不同。這些中國新移民社區的演變，展示了韓國貌似同質社會的族裔群體內部的多樣性，以及在韓華人移民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跨國性。老華僑、朝鮮族和新移民對當代韓國的文化、經濟和社會等各個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4章「日本的中國新移民」（邵春芬）關注中國新移民社區在日本的形成與發展。筆者透過官方的統計資料、當地媒體報導以及深度訪談等資料，描述和分析了日本華人社會的變化，中國新移民社會在人口結構、社會結構、歸屬意識等方面呈現的顯著特徵，以及新移民人口的持續增長對既存的老華僑華人社會和日本社會的影響。

第5章「草根的選擇」（代帆）聚焦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移居菲律賓的中國新移民。筆者分析了華人移民的歷史、族群網絡以及已有的華裔經濟如何影響新移民在菲律賓的生存和發展。筆者認為，當代國際移民潮並不完全是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移居到發達國家謀生，發展中國家隱含的發展機遇以及相對優勢也會吸引大量的移民。新移民不選擇經濟更為發達的西方國家而選擇了經濟比中國落後、本



身又在不斷向外移民的菲律賓的主要原因，其一是由於商業經濟的落後而隱含的無限商機。其二，族群網絡是使移民長盛不衰的重要機制。其三，即使菲律賓的移民政策維持不變，市場本身也會對移民規模做出相應的調整。筆者還分析了菲律賓中國新移民的規模不會無限制擴大的原因。

第6章「本土化的族群網絡」（錢江）聚焦於柬埔寨中國新移民社區的族群網絡形成以及本土嵌入等問題。筆者認為，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華人資本主義及其帶有明顯族裔特徵的創業和企業家精神，對中國新移民能較為順利地適應海外的不同生存環境有著顯著的影響。但新移民的社會融入除了受益於敏銳的商業嗅覺和企業家精神外，還需要建立起一些制度化的機制，並依賴這些機制來保護自己的商業利益，發揚光大企業家精神以及推動跨國主義實踐。

非洲部分一共有三篇論文。第7章「南非華人屬性的政治」（朴尹正）。本文分析了南非華人的三個不同社群（即南非華裔，第一和第二代台灣籍移民以及中國大陸新移民）的構成及其政治認同。筆者認為，南非華人的「華人屬性」根據情境與時間而發生變化。南非的華人人數眾多，足以影響地方甚至國家政治。多年來，華人經常因為自身的「華人屬性」而備受攻擊。然而，他們偶爾也會利用華人屬性的優勢（如種族，「中國崛起」等）來實現自己在南非的利益。儘管華人受到憲法和其他進步立法的保護，南非華人仍然處於一個較為尷尬、被邊緣化、模糊不清及不確定的社會位置。

第8章「在加納的中國商人」（展易）聚焦於加納首都阿克拉的中國新移民。筆者用「闕限」的理論框架來分析加納的中國商人為何無法建立一個紮根於當地社會的華人族裔社區的原因，把中國商人在加納的經商經歷置於「通過儀式」中的第二個階段，即（在非洲的）闕限階段。中國商人一方面堅持只在當地短暫居留，無意去適應並最終融入當地社會，亦無意建立紮根於當地社會的華人社區。另一方面，他們日漸與自己原有的社會和文化疏遠，無法跟上中國社會在

他們離開以後的變動節奏。於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延長了通過儀式中的闕限階段，因而被困在其中不得前進。

第9章「社會融入的困境」（沈曉雷）關注中國新移民在津巴布韋的社區構建狀況以及他們與當地社會和居民的關係，分析導致他們未能很好地融入當地社會的原因。筆者發現，移居津巴布韋的中國新移民具備了較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的條件。隨著居住區和商業區的相對集中、華僑社團的成立及華文媒體的發展，津巴布韋的華人社區也開始成型，逐步成熟。但是新移民社區的構建仍然局限於一個內向型的社會環境，與外部世界和當地人基本隔離，從而降低了新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能力和動力。

大洋洲部分有兩篇文章。第10章「重新發現『新金山』」（楊伊璐、潘秋萍、高佳）。筆者從澳大利亞和中國兩國社會經濟轉型的角度出發，分析華人移居澳大利亞的動因、趨勢及特點，重點描述華人社區在人口構成、族裔經濟發展和文化教育事業等方面出現的新現象，探討源自中國大陸的各類新移民（包括留學生、遊客以及投資者）對澳大利亞華人社會和主流社會的影響，闡釋華人移民如何從陌生人變成華裔澳大利亞人的身份認同和社會融入過程。

第11章「新西蘭華人新移民」（劉良妮）。本文分析了移居新西蘭的中國新移民的遷移、社會融入、以及移民回流和再移民的趨勢。從1997年起，中國成為新西蘭的第二大國際移民來源國。筆者把新一波的中國移民潮放在新西蘭1986年後移民政策的評估和調整，以及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下進行分析。重點是探討中國新移民在新西蘭的基本人口狀況，勞動力市場的參與狀況以及跨國移民的靈活性等。筆者認為，新西蘭華人社會的發展受制於政府政策的影響。筆者發現，由於移民在居住五年之後即可獲得新西蘭的公民身份，華人移民因此可以獲得更多的跨國靈活性。新西蘭護照保障下的跨國移民自由度，使華人移民能夠較為順利地移居到第三國，實現自己的終極移民目的，而不必留在新西蘭。筆者在結論中還分析了毛利原住民對

華人新移民的負面看法和態度。筆者指出，接收國社會的種族關係，對新移民的社會融入和社區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

歐洲部分有三篇論文。第12章「族裔身份認同與社會融入」（石亞當、鄭得興、胡麗燕）考察了捷克布拉格的華人社區，提出了捷克華人新移民的認同形成、社區建構以及社會融入的模式。筆者首先描述和比較了中國新移民和越南移民社區的發展模式和策略的差異。然後深入分析了布拉格的華人社區，從跨代際的角度來解釋其內部異質性、行為特徵和社會融入模式。他們的研究發現，通常來說，絕大部分流向歐洲大陸（英國除外）的中國新移民來自溫州農村，而不是城鎮或大城市。但捷克的情形是個例外，中國新移民雖然大多數來自浙江青田，但他們大多是白領城鎮工人、前公務員和希望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員工，而不是農村的貧困農民。研究還發現，第一代比第二代華人移民與祖籍國會保持更加緊密的聯繫，但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華人移民在民族自豪感方面沒有顯著的差異。此外，華人移民互不信任，對建立華人組織缺乏興趣。他們之間缺乏信任感和凝聚力，增加了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難度。

第13章「西班牙華人社會剖析」（李明歡）分析以當代中國新移民為主體的西班牙華人社會的人口、職業結構、地域分佈以及新移民的跨境遷移路徑、異域謀生策略及身份認同的趨向。筆者認為，就移民路徑而言，中國新移民依託親緣地緣紐帶式「連鎖遷移」的傳統模式，仍然是當代跨境遷移的重要路徑。但是，當代的遷移效率既受制於移居國的移民接納政策，也受移民群體自身素質的影響。就異域謀生策略而言，「開業當老闆」已經成為西班牙中國新移民的凸顯模式。中國新移民的老闆數量高，一方面與西班牙的經濟環境相關，他們主要從業的領域是中餐館、酒吧和零售業。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開業所需的起步資金較低，適合家庭式經營，因此華人新移民通過資訊互通、資金互助而尋覓到了大量創業當老闆的機會。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助推了西班牙華人的老闆經濟。就身份認同趨向

而言，全球化催生了中國新移民的跨國化生存，從經濟活動、文化傳統到主觀認同，都同時依託於祖籍國和移居國。

第14章「新世紀華人留學生與海外華人社區建設」（武斌）聚焦於英國華人留學生社會交際網絡的建構，它包括華人留學生內部（如中國大陸留學生與來自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家的華人留學生）和外部（與當地華人及非華人群體）之間的交流。筆者關注的主要問題是：國際留學生可否被視為所在國少數族裔社會的一部分。如是，他們與當地社會以及當地人（包括華人）如何互動。以英國諾丁漢華人社會為例，筆者探討了這個潛在移民群體的社會網絡建設，以及他們與當地非華人社會和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筆者認為，華人留學生移民不僅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目的地華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動力，而且為改善和強化當地華人社會的凝聚力及其社會融入帶來了機遇和積極影響。

有關美洲華人社會的論文一共有四篇。第15章「拉丁美洲的中國新移民」（高偉濃）對當代拉丁美洲華人移民社會作了全景式的描述。筆者發現，拉丁美洲絕大多數新移民來自中國農村，大多通過家鄉基於地緣社會網絡（其中很多人有血緣關係）移居拉美國家。很多人以家庭團聚的方式申請移民，也有越來越多的來自中國鄉村的個體經商者（一小部分來自小城鎮），還有一部分新移民屬於「非正常渠道」入境者。在拉美地區，並非所有居住著華僑華人的地方都已經完成了「社團化」的組織形態。拉美很多國家和屬地的華僑華人在居住方式上，「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狀態並存，因而決定了不同狀態下的「社團化」程度。筆者還指出，拉美很多國家的中國新移民以居留證的方式在當地生活和工作。他們存在著比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新移民更為強烈的「家鄉是最終歸宿」的意識，不過，這種意識尚屬感性層面，並非是他們在權衡各種各樣因素後建立在深思熟慮基礎上的決定。此外，一些新移民的「最終歸宿」地不一定就是祖籍地或是中國某個地方，而可能是拉美某個有其他家庭成員、親戚或朋友居留的

國家，還有的是域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歐洲國家等），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重新移居到這些國家比回歸和重新適應中國要容易。

第16章「古巴華人的歷史，現狀與未來」（胡其瑜）聚焦於古巴華人社會的發展和變遷。筆者從輝煌的歷史，易變的現狀和開放的未來三個部分來描述華人社會的發展，著重探討在美國與古巴關係正常化的背景之下，中國新移民是否能在哈瓦那重建曾是拉美國家首個且規模最大的唐人街，以及中國在古巴的投資能否進一步擴大等問題。古巴華人社會歷史悠久，最早的華人移民是契約勞工。在與奴隸一起經歷了種植園最初8年的奴役之後，華工開始逐漸擺脫奴隸般的狀態，從種植園搬到了哈瓦那和各省的城鎮。在那裡，他們以合法的自由居民身份謀生，依靠由市場決定的工資來贍養家庭，也有不少人在各個城鎮做些小生意。唐人街由此而發展成一個基於由企業家精神與家庭勞動驅動的繁榮的族裔經濟社區。二戰後，古巴的反美帝國主義革命轉向共產主義並與蘇聯結盟，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與小資產階級性質的華人社區兩者之間很快發生了衝突，致使華人公司倒閉，生計遭到破壞，大多數古巴華人離開古巴，一些人則回到了中國，唐人街因此由盛轉衰。自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在古巴的投資致使中國的工程師、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翻譯人員和其他專家陸續來到古巴，但只有少數中國新移民追隨中國政府資助的開發項目而來，在古巴最類似於中國新移民的群體，是自2006年以來抵達古巴的數千名中國留學生。不過大部分來古巴留學的中國學生學成後都返回中國。筆者預期，隨著古巴的經濟改革開放和古中關係的改善，具有創業精神的中國新移民，將會像早已在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非洲經商的華人企業家那樣，帶著私人資本來古巴投資和發展。

第17章「加拿大中國新移民」（李曉玲、李勝生）主要探討了加拿大中國新移民的形成以及他們在加拿大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筆者認為，二戰前加拿大華人社會的發展受到限制，是由於在加拿大社會種族化的過程中，華人及華人社會被邊緣化。二戰後至1990年代

中期，華人移民主要來自香港。自1990年以來，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逐漸取代了香港移民，成為加拿大主要的華人移民來源。與以往的移民相比較，中國大陸新移民的教育水準較高，他們的來源地以及職業背景更趨向於多元化，定居地也傾向於像多倫多和溫哥華這樣的大都市。新移民的大量湧入，改變了加拿大華人社區的組成。過去由美歐白人居住的富人區，逐漸成為很多中國新移民的居家選擇，形成高密度的華人聚居區，伴隨而來的是族裔經濟的高端發展（包括高檔餐館、商業和專業服務設施等）以及普通話的流行和普及。在新移民刺激加拿大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他們成為公眾發難的對象，新移民經常被抱怨為使當地房地產價格狂飆的始作俑者。筆者預期，加拿大未來的經濟發展，依然會持續依賴有專業的技術移民。隨著更多大陸新移民的進入和定居，加拿大華人社區將會不斷地被重塑，而公眾對其發展的反應也很可能會隨之不斷地變化。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轉型，對人才的渴求以及就業機會的不斷提高和擴大，相對於加拿大新移民在社會融入過程中的種種困難以及勞動力市場上收入不平等的持續發展，很可能會導致新移民回流中國，因而未來中國移民加拿大在數量上可能會有所減緩。

最後一章「移民創業、社區發展與社會融入」（周敏、劉宏）聚焦於美國移民創業。筆者首先討論了目前相關研究中存在的三大短板：第一，現有研究的理論命題大多建立在創業是移民在移居國迫不得已的選擇這一基本假設上，因而忽視了移民個體（無論低技能或高技能的少數族裔移民創業者）的主觀能動性。第二，現有的研究注重創業在個體層面的經濟效益，忽視了其對社區形成和發展的作用。第三，現有的研究忽視了移民創業對個體融入當地社會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筆者進而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他們認為，移民創業不僅受個人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還受到中觀層面（族裔社區和社會網絡）和宏觀層面（祖籍國與移居國的社會結構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移民創業與移民社區的建立和發展應該是相互關聯，相互促

進的。通過對美國華人新移民的個案分析，筆者發現，創業對移民社區有兩大影響，一是創業對族裔經濟的影響；二是創業對社團組織的影響。這兩方面的影響可以刺激社區發展，給族群成員創造和提供移居國主流社會所缺乏的族裔經濟和族裔文化資源，因而對移民融入移居國社會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 致謝

首先，我要感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南洋理工大學文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中心，南洋理工大學華裔館，以及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由於他們的慷慨資助，我們於2015年12月在新加坡成功地舉辦了有關中國新移民的國際研討會。本書的論文得益於這次研討會。

無需贅言，我的每一項研究都離不開我的工作單位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UCLA王文祥伉儷美中關係與傳媒講座教授基金，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鼎力支持。這項研究也不例外。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有幸得到世界著名歷史學家和華僑華人史學泰斗王賡武教授撥冗作序，令本書錦上添花，我深表謝意。我要向為本書撰寫了18篇論文的25位知名專家學者表示謝意。能夠有機會與他們通力合作，交流學術研究成果，本人獲益匪淺，深感榮幸。本書由新加坡世界科學出版社付梓出版，得益於世界科學出版公司主席潘國駒教授的慷慨支持，以及出版社編輯陳文慧女士的全力協助，本人不勝感激。書稿的簡繁轉換還得到了UCLA東亞圖書館館長陳肅女士的幫助。英文參考文獻的校對得到我的學生Lauren Nip的協助。此外，參與部分章節第一稿翻譯的譯者有：郭南（序、前言、第1章），許亮、羅楠（第7章），譚松峰、黎相宜、陳豔琳（第8章），郭曉晨、代帆（第16章），范磊（第18章）。在此一併鳴謝。

行文至此，我要特別地感謝我的另一半，與我共同度過了39個春秋的先生郭南。我們相識在廣州中山大學美麗的康樂園，他不僅是我所佩服的見多識廣的師兄，人生旅程的終身伴侶，也是我從事學術研究30多年來的忠實擁躉和粉絲。我的每一個研究項目和學術成就，都離不開他的全力支持和體貼關愛。這次他也一如既往，自願無償負責本書的審譯工作。這是他幫助我翻譯和審譯的第三本中文學術著作，當然還有很多我的其他論文的中文翻譯。他為人低調，做事極為認真負責。有時為了準確地翻譯一個學術術語，他會跟我在飯桌上討論半天，直到徹底弄懂這個術語的內涵和外延。除此之外，他任勞任怨地擔當我的「高級私人助理」，肩挑幾付重擔：專職司機，專職時事解說，專職旅遊策劃，專職品酒師，專職廚師等等。他每天都一絲不苟、興高采烈地做好三頓飯，碗筷擺好、飯菜上桌後才把我從書房中召喚出來吃飯。值得一提的是，他為了避免喊聲過大或過小，總是用很中性而無感情色彩的搖鈴方式把我召到飯桌前。這鈴鐺是一個我們當年在尼泊爾登喜馬拉雅山時買的「神鈴」，聲音清脆悅耳，聞之心曠神怡，我們稱之為「和諧鈴」。和諧鈴於是伴隨著我們每天和諧地生活和工作，樂趣盎然。

最後，我要向父母的在天之靈鞠躬致祭。母親姚耀萍2018年春辭世。母愛似海，深沉細膩。父親周磊明2020年2月也離我而去。父愛如山，寬厚仁慈。父母養育之恩，終身難忘。他們生前也是海外華人社會的一員，三十多年來在太平洋彼岸為我和家人牽腸掛肚，祈禱祝福，默默支持。我的每一本中文著作和每一篇中文論文，父母都會興致勃勃，充滿慈愛和驕傲去仔細閱讀，是九旬老父生前「天天讀」的內容之一。此書的英文版是獻給他們的。我知道，父母在天之靈此刻正在期盼著《長為異鄉客？》的出版！

五洲四海，潮起潮落，四海為家，落地生根。

2020年8月於美國洛杉磯